

纪念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发表50周年

编者按：今年五月二十三日，是毛泽东同志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发表50周年。本刊发表一组短文，一方面是为了缅怀毛泽东同志；一方面是为了继承和发扬《延座讲话》精神，更好地贯彻党的“一个中心，两个基本点”的基本路线，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。

《讲话》是对反映论的重大发展

黎 山 晓

《延座讲话》所阐述的文艺反映论，是唯物的、实践的、能动的和审美的反映论，这是对反映论的重大发展。

社会生活第一性，文学艺术第二性，是《延座讲话》首先阐明的唯物主义的观点。《延座讲话》指出：生活是“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”，“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，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。”对反映论的这一唯物主义原理，有人只采取承认一半的态度，即认为写实的作品是生活的反映，而对非写实的作品，特别是以变形、象征、倒错、荒诞为整体形式特征的作品，则认为不是生活的反映。这种观点是站不住的。郭沫若的《女神》，并非是对社会生活的如实描写，但其主观情感的抒发、象征意象的创造，则是五四时代精神的深刻反映。现代主义作家卡夫卡的《变形记》中，一个循规蹈矩、忠于职守的人，变成了一只包括家庭成员在内人人厌恶的大甲虫。当然，这是变形的、荒诞的描写。但是，通过这种描写，不能曲折地反映出在全面异化的环境里，人际关系隔膜、孤独和敌对的情况吗，不能曲折地反映出资本主义深刻的社会危机和精神困惑吗？生活是文艺的源泉，文艺是生活的反映，任何时代和阶级的文艺，概莫能外。

既然生活是文艺的源泉，文艺是生活的反映，《延座讲话》理所当然地提出了深入生活，深入工农兵（今天，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，是包括在工农兵之列的）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问题。工农兵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，是生活的主体。不深入他们的生活，也就不能把握生活的主体，把握生活的底蕴和趋向。其他人的生活，是否也要了解，也要深入呢？《延座讲话》中关于要“观察、体验、研究、分析一切人，一切阶级”的论述中的“一切”，就表明了肯

定的态度。但是,生活是一个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整体,不了解生活的主体,不了解决定历史发展的主导方面的工农兵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,又怎能写好其他人的生活呢?

深入工农兵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,自然就有一个立足点的问题。立足点不同,反映的东西就不同。如果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,即使到工农兵和人民群众中去了,也会仍然“鄙弃它们”,拒绝对于他们的描写;即使描写,也是“衣服是劳动人民,面孔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”;或者为着“猎奇”,“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”。看看今日一些不能正确描写群众的落后和愚昧的部分作品,某些公开鄙弃新人描写的论调,《延座讲话》50年前的批评,不仍适合它们吗?所以,立足点的问题,亦即为什么人的问题,“是一个根本的问题,原则的问题”。这个问题不解决,就不能正确地解决反映工农兵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的问题。

《延座讲话》所阐明的反映论,既和唯心主义相左,也和机械唯物主义有别,因而反映不是消极的、被动的,而是积极的、能动的。当然,这种反映的能动性,不是一种唯意志论,而是和受动性相结合,包纳受动性于自身的能动性。反映的真正的能动性,不是不接受客观生活和客观规律的制约,而是在其提供的舞台上,充分发挥主体的主导作用。具体说来,这种反映的能动性,体现于以下三个方面:

一是主观性。《延座讲话》中强调文艺工作者立足点的转移,情感的变化,创作情绪的重要,都是为了在反映过程中发挥能动的主观作用。反映之所以需要主观性(这里指的不是主观主义的主观性,而是作为主体特征之一的主观性),就在于人的反映,特别是艺术的反映不是客观单向的作用,而总有主观的介入和贯注。没有主观的能动作用,也就没有艺术的反映的发生。

二是自主性。《延座讲话》是肯定作家的自主性的,但对自主性作了具体的分析。“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,看作高踞于‘下等人’头上的贵族,那么,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,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”,他的反映的自主性自然也是不能实现的。而只有和时代结合,和群众结合,自主性方能得到真正的实现。

三是创造性。有人常将反映和创造对立起来,以为反映不是创造,创造不是反映。其实,只要是人的反映,无不带有某种创造性。当然,创造性有高低之别,有不同层次之分。文艺的反映,是一种需要高度创造性的反映。《延座讲话》强调“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”(着重点为本文作者所加),并在多处提出“创造”问题的重要,可见对反映的创造性的高度重视。

《延座讲话》阐述的反映论,既有其普遍性,又有其文艺创作的特殊性,即审美反映的特殊性。这个问题在《延座讲话》中多次从不同方面论及,这里只撮其要点而言之:

审美反映虽然要以哲学为指导,但这种指导并不能取代审美反映自身的特点。所以,“学习马克思主义,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,观察社会,观察文学艺术,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。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,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、电子论一样。”

审美反映是对于美的发现、开掘和升华。《延座讲话》中关于生活和文艺“两者都是美”的论断,指导我们要善于在生活中发现美、开掘美,并进而升华为艺术美。生活中虽有假恶丑的存在,但也必有与假恶丑相对立并与之抗争的真善美的存在。看不到美的人,是不能进行审美反映和艺术创作的。

审美反映是以人为中心的反映。《延座讲话》强调“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……是第一位的工作”,如“不熟,不懂”,也就“英雄无用武之地”。《延座讲话》如此突出的强调,就是因为文艺作

品不能离开“各种各样的人物”的“创造”。现在有一种论调，认为作品可以淡化人，甚至可以不用写人。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。即使不写人的性格，也要写人的情绪、感受和想象；即使不写个体的人，也要写群体的人；即使不写现实中的人，也要写与现实有关的想象中的人；即使没有直接出现的山水作品、花鸟作品和动物作品中，也寄寓着人的情感和理想，弥漫着人的品性和氛围，是人的对象性的表现。所以，审美反映以人为中心，可以说是一个普遍规律。当然，作为审美反映中心的人，不是抽象的人，不是超时代、超阶级的人，而是现实的人、社会的人、活生生的人，这也是《延安讲话》反复加以阐明的。

审美反映既然是以人为中心的反映，是对活生生的人的反映，那么这种反映必然是理性把握和情感体验相结合的反映。《延安讲话》提出在反映过程中，不仅要“观察”、“分析”、“研究”，还要进行“体验”的观点，无疑地说明了理性和感性结合的重要性。这样，在反映过程中，既反对了排斥感性的唯理主义，也反对了排斥理性的非理性主义。

典型化，是审美反映成败的一个关键问题。只有经过典型化，生活美才能转变为艺术美：“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，更强烈，更有集中性，更典型，更理想，因此就更带普遍性。”不经过典型化，生活的本真、历史的深蕴就难以其典型的、理想的形态，生发出震撼人心、唤醒灵魂、陶冶情性、塑造人生的深远力量。所以，认为典型化不再是审美反映中的普遍规律的观点，是不能成立的。审美反映毫无疑问带有个别的、特殊的、感性的、偶然的因素，但是这些因素若不通过种种中介大致趋向于（而不是归结于）一般、普遍、理性和必然，那么你那个审美反映也就失去了他人认同、感受的可能。问题并不在于审美要不要典型化，而在于不要把本来千差万别的典型化定于一种模式。这是我们学习《延安讲话》精神时，要加以注意的。

《延安讲话》所阐述的反映论，是唯物的，实践的，能动的，又是审美的。这样，就在反映的问题上反对了唯心论、直观论、机械论以及审美取消论，而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，将反映的实践性、能动性和审美性有机地结合起来，从而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反映论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。

《讲话》推动了解放区文学的发展

孙 党 伯

50年前，毛泽东同志发表的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，总结了“五四”以来新文学运动的历史经验，提出了我党领导革命文艺的理论、方针和政策，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在《讲话》的指引下，中国现代革命文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，延安及各解放区的文艺运动得到了蓬勃健康的发展，面貌焕然一新。

《讲话》所论述的根本问题，是文艺“为群众”和“如何为群众”的问题，这是“五四”以来新文学渴望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。“五四”时期提出过“国民文学”，“平民文学”的口号，“左